

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 主办 杨玉圣 主编



学术共同体文库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American Aid and
Sino-American Alliance*

任东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学术共同体文库

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 主办
杨玉圣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 任东来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6

(学术共同体文库)

ISBN 978-7-5201-2750-9

I. ①美… II. ①任… III. ①抗日战争-中美关系-文集 IV. ①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7721 号

· 学术共同体文库 ·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著 者 / 任东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张晓莉

责任编辑 / 张晓莉 郭锡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插 页: 0.375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750-9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之光 依然闪烁

吴 耘

东来的《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是在已故美国史泰斗杨生茂教授指导下于1988年完成的，也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制度后完成的第一篇美国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陶文钊先生等学界师友的关怀下，曾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现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但仍不时有年轻的朋友询问此书。故当东来的好友杨玉圣教授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以《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题再版时，我觉得无论是为了怀念英年早逝的东来，还是为了读者阅读便利、促进学术交流，这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东来的这本专著，浓缩了他的学习、研究、生活和工作，也体现了美国史研究领域前辈们对他的栽培和提携。因此，我很赞同玉圣的建议，将此书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

与1995年版相比，本版除书名做了微调外，还增加了东来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一篇关于该时期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币制改革的专题论文以及东来当年接受其弟子胡晓进博士的一篇访谈。在这篇访谈中，东来比较全面地回顾和反思了其求学、教学尤其是他的学术心路历程，或可供读者阅读时作为参考。

1985~1988年，东来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曾在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一年、访问半年，最后一个学期回到南开。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返回南开，在杨先生身边做访问研究，为时半年。2018年，是我们相识三十周年，也是他获得博士学位三十周年。然而，当此博士论文新版之时，我们的相知相恋、相依相

伴，往事历历又萦绕心头，一切恍如隔世，又仿佛还是昨日。

东来的博士论文和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有着深厚的渊源。作为该中心第一届学员（1986~1987年），他原计划在这一学年里充分利用该中心得天独厚的英文研究文献资源，完成博士论文写作。不料，因选修的都是美方教授主持的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课程，有大量的英文阅读和写作，故无暇顾及毕业论文写作，只能利用各个假期搜集整理资料。当十个月的课程项目结束后，征得杨先生同意，东来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重返中心，完成博士论文。除了撰写博士论文之外，他还参与了杨先生主持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的编写工作。在这期间，杨先生与东来围绕着如何编撰教材、如何写成一篇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大量来往信函。杨先生告诫东来，写作一定要在充分阅览资料的基础之上。老一代学人追求完美，甚至对稿纸的使用、漫画图片的挑选、参考目录的编写，都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一封封亲笔书信，透出杨先生对学术的严谨，对于后辈的提携、关心，令人动容，令人赞叹，令人神往。所有这些文字，都没有高腔大调，先生就是这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东来的治学品格。

再说具体一点，在东来博士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杨先生总会及时来函给出意见。如对于结论部分，杨先生指出：结论一定要言之有理，不必虚设，更不必故作惊人之语。在杨先生看来，结论应当有学术价值，而不能鸡毛蒜皮、人云亦云。当论文接近杀青之时，杨先生又寄来一函，建议东来一定要格外注意前人的卓越研究（其中特别提到了陶文钊先生和丁名楠先生）。杨先生再次强调，从组织字句到书写字迹，均应精益求精、小心翼翼，脚注也须规范化——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字而都是手写。

我与东来的结识和相恋也是在这一时期。1988年3月，是东来结束在南京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回到南开，完成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来自不同系科的他和我，机缘巧合，选了同一门法语课。我在本科时选修过法语，本该进入高层次班级，因为偷懒，便选了基础班，享受驾轻就熟之感。前两次课，我和师姐一起，未留意到别的同学。当时还时兴交谊舞会，3月中旬，正值博士生会组织联欢，我约了在我代课的英语班级的几位体育特长生前往。刚跨进简陋的“舞厅”之时，我兀然见一人，正埋头扫地，低标号的水泥地被扫得尘土飞扬。此人就是东来。

那晚最后一支舞，是东来请我跳的。他问我：“你是何老师法语班的？”由于前两次课，我没有注意其他同学，故心里一愣，反问他是如何知道的。

东来说他也在那个班，还问我是哪个专业的博士？（二外是博士生必修课）。我说我在旅游系读硕士，二外也是必修课。他随即介绍了自己姓名谁，眉飞色舞地说刚从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回来。原来，他自己法语基础差，很自然地注意到法语发音比较好的我。那晚他看到我进了舞厅之后，赶紧扫地来掩饰内心的激动。这次舞会上的邂逅，让我注意到了法语课上的东来。

下午的法语课，他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老实地坐在第一排。法语老师习惯从前往后点学生朗读课文，他总是第一个被叫到，百般无奈地把法语当成英语来读。有一天，他得知五一假期我将去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查阅资料，主动提出给我写几封介绍函，约我临行前到他宿舍取。启程前一晚，我来到他在六楼的宿舍。他拿出几本影集介绍中心的师生和那里的生活。时间静静地流淌，东来兴奋地翻弄着影集，修长的手指在页面上滑动。4月底的晚风徐徐，轻轻拂起浅蓝色窗帘，荡起我们心中的圈圈涟漪。“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般美好，应该就是我们的“初见”吧。

结束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之行后不久，东来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宿舍门口，请我去体育馆听摇滚音乐会。返回校园的路上，他自豪地介绍起导师杨生茂先生和自己的研究方向，踌躇满志，神采飞扬，说话带笑。他告诉我，博士论文已近尾声，导师基本满意。此时的结尾工作就是校对注释和书目，然后交付打印。等待打印稿的空闲日子，他会去跳舞，看录像，有时也约上我。5月底，他拿到打印稿，请我帮忙校对英文部分，我很快完成了校对。当时，我对于抗战的了解比较片面，对内容非常陌生，只记住了摩根索（Morgenthau）、史迪威（Stilwell）、马歇尔（Marshall）等一串相关之人和相关之事。

也就在此期间，杨先生出差从外地返回天津，东来约我一起去火车站接站。东来说：“我这位导师虽然是从美国回来，学问深厚，但看上去很朴实，有点像农民。”那天见到杨先生，确如他所描述，穿着朴素，但终究“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能察觉先生略微有些发福的身躯里的学者神韵。杨先生面容慈祥，眼神无比温暖，让人感到安心。我有幸认识先生，倾听师生谈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更多还是东来说话，先生颌首微笑，让我觉得从美国史研究圈外站到了圈内的边边上。

6月底，博士论文毕业答辩如期举行，东来邀请我去旁听。答辩地点就安排在南开历史所一间陈设简单的小会议室，门的左侧还有两个贴墙而立的

简易书架。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围着长方形会议桌就座。他们是杨生茂先生、丁则民先生、刘绪贻先生和冯承柏先生。杨先生的硕士、现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徐国琦博士，担任秘书。据国琦回忆，委员会成员还有张友伦先生。这场答辩，除了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学生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居然没有其他旁听者。各位教授对论文不吝美言，我听了心花怒放。只有冯先生格外严谨，对论文提出了多条意见，指出哪一页哪一行有个什么小错误。我听了心中不悦，也担心东来不能接受，便给他投去一个灿烂的微笑。若干年后，东来也成为博导，在招生面试和学生答辩时，发问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东来博士毕业后，先后和我来到南京大学任教。女儿出生前，我的课时减少，那时也还没有电脑，一大乐趣就是在方格稿纸上为他誊写稿件。我伏在陋室里的折叠饭桌上，不自觉地弓起背部，埋头疾书。时间稍长，腹中小生命的胳膊和腿便会四下伸展，“提醒”我挺直背部。东来下班回家后，常为我讲述二战故事，极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史迪威、摩根索和顾维钧这些名字，渐渐地不再陌生而无趣，我为中国远征军将士丧身野人山而唏嘘不已，对飞越驼峰航线运送抗战物资的勇士们深怀敬意，为二十万军民以血肉之躯修筑滇缅公路的壮烈而感动。

在学术道路上，东来不仅有杨先生耳提面命、悉心指点，而且还极为幸运地得到美国史前辈和同仁们的无私指导和帮助。博士论文原本有机会纳入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复旦汪熙教授还专门为之作序。后因故搁浅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时任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热心为东来的博士论文出版而奔波，终于联系上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陶先生的这封信中，为推动学术进步的殷殷之心，令人感怀：

东来：

夏天来信早悉。我上信中提到我跟杨奎松、王健朗写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已答应给广西师大出版社，该社打算出一整套《抗日战争史》丛书，并已出了几种，出版社打算补贴200万元，希望能创出社会效益。他们正好来约我们写外交的书，我们就答应了。其实，他们早就约我写一本中美关系的书，我说，我已写了一本，不能自己重复自己，至今，中美关系这个题目还无人写，我就推荐了你的书

稿。有一位同志，叫侯样祥，也是个年轻人，原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现在到了《文化报》，他是这套丛书的副主编，因此书的作者多半是北京，所以许多工作实际是他在做。他问我书稿在不在手头，我说，不在手头，但我这里有他的论文。于是他把论文要去看了。其间催他几次。最近他回话说，论文读过，内容很好，但粗糙些。我说，论文赶时间，来不及精雕细刻，估计那些问题在书稿中都会得到解决。于是他原则上同意接受此书，并请尽快把书稿寄来，同时准备适当图片。如果你同意，请即让你妻子把书稿寄到我处。寄近代史所地址为好。

即问

近安！

陶文钊 1990. 8. 31

有了出版单位接受之后，东来还要进行一些相应修改，以达到出版的规范和标准。90年代初，教育部有项特定政策，即35岁以下无基层工作经验的青年教师须下乡锻炼，方能有出国或晋升资格。东来此时被安排在江苏省江阴县南闸镇某皮件工厂，给意大利专家做翻译，他计划利用下乡这段时间修改书稿。未料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初创阶段的乡镇企业管理尚不规范，常惹得专家发火。工人不懂英文，专家便对着东来撒气。东来觉得自尊受到伤害而感到沮丧。到了晚上，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乡下环境虽然恬静，却一看书就犯困，无法按计划修改书稿。

当时还只是周末休息一天的每周六天工作制，可爱的女儿刚满周岁，东来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阶段，努力争取每两周从乡下回来一天。同时，他集中注意力，将修改书稿放在工作日的晚上。进展顺利时，他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剪剪裁裁，再写一些。速度还算快。”到了厂里放农忙假的6月中旬，他有了两天时间，集中修改了书稿，匆匆写下简短前言。作为《抗日战争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好事多磨，直到1995年才面世。当他兴冲冲地把新书拿到我面前的时候，已是1996年年初了。

玉圣多年后还认为：这本书是东来的学术代表作，也是美国史博士论文的典范之作。不过，看到这本书，我更多地想到皮鞋厂，想到他风尘仆仆回家看望我们，想到他陪专家看病，趁其在医院挂水也要给我手书一封。江阴飞鸿，提到书稿的地方并不多，更多是分享女儿成长的喜悦和讲一些鞋厂的趣事。此刻，他是慈父，是关心妻子的丈夫，我几乎忘了他还是一位学者。

到了20世纪末，东来对美国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转向美国宪政研究，但对于中美抗日同盟的研究，在他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2009年初，他仍在凤凰卫视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制作的系列节目中接受采访。选修他课程的国际学生，几乎都曾在他的带领下参观过位于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墓，听他满怀激情地介绍中、美、苏飞行员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故事。他还分别领着女儿和她的同学、我和我的母亲，在松涛掩映的公墓，穿行于庄严肃穆的雕塑和石碑间。夏日午后，他拎着黄色的大水杯，伴随着阵阵蝉鸣，凝视着烈士雕像，那情景如同石碑上的文字，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2013年5月2日，东来在52岁生日前两天，永远地离开了我。十一黄金周，玉圣专程来宁看我，复印了东来保存的一些书信。我依旧沉浸在悲苦中，喋喋不休地讲述往事。玉圣用手比画着说：“你写下来，不要管修辞，不要管句法。”他认真地告诉我，学者有两种生命形态，一是肉身生命，一是学术生命。学术生命通过学术作品和弟子而得以延续，学术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确，作为学者东来的妻子，陪伴他一路走来，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永恒意义，就像著名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那句小诗：诗非意义，而是存在（A poem should not mean, but be）。东来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学术生命还在延续。在有限的人生历程中，他一直在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这种平凡而不庸俗、充实而有光辉的短暂一生，也证明了只有当智慧之光普照世界之时，我们方能因真理而得自由。

我特别感动的是，在东来不幸英年而逝后，李剑鸣教授和玉圣教授等学界友人一直关心他的成果总结与出版。在东来逝世周年之时，出版了《有厚度的学术人生——任东来教授追思集》和《读书的学问——任东来教授书评集》。近几年来，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我注意到媒体对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奋勇抗战的那段历史的报道，更加多维度，也更加丰富多彩。欣慰之余，我也不免怅惘。我和女儿谈起，如果爸爸在，他又会教给我们怎样的知识？还是重述中国远征军野人山撤退的悲壮？

2018年，东来和我相识三十周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三十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五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玉圣又费心将本书以精准的方式新版，让东来三十年前对于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的研究再现于世，展现抗战历史的多元画面和多维视角。我深深地感谢玉圣，他以此方式延长着东来的学

术生命，让他的学术之光依然闪烁，让他的学术之魂伴我余生。无论是对于天上的东来，还是对于我和我们的宝贝女儿，无疑都是极大的慰藉。希望此书对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既往五年，我没有勇气再翻阅那些围绕这部书稿的来往书信，装着信件的整理箱盖犹如泪水的闸门，这篇序也是一拖再拖，断断续续，写得苦涩悲痛。为了核实信息、完成记忆碎片的拼图，我不得不查阅信件和日记，感受他的缱绻爱意和无限柔情，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生怕打湿单薄的旧信纸，晕染了字迹，便不断起身，找些分神的事来做。

我还要感谢东来的弟子们，把对老师的爱戴延伸到我的身上，五年来始终温情地陪伴我。李丹博士偕同先生和张庆熠博士，帮我整理东来留下的书籍。于英红专程从杭州来宁，与王娟娟、邱美荣一起陪我整理信件。江振春博士把东来与杨先生的通信进行了完整的扫描。我悲痛急需抒发之时，总可以拨通在上海工作的美荣的电话。现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的胡晓进博士，一直把我当成亲人一般，关心备至。去年9月，在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我们聊起往事，晓进问我，愿不愿意为此书再版写一篇序。我说，从来没有写过此类文章，不知如何下笔。晓进鼓励我，就把你讲的这些写下来就很好。晓进、胡美和于英红还不辞辛苦，负责书稿的录入工作。第一版没有电子文稿，书稿的录入，特别是文献部分，尤为烦琐。我在感激之余，又深感不安，因为晓进忙于学术，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希望不要给他增添太多负担。

对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尤其是张晓莉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暨县域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树忠教授的大力支持，我本人也一直深怀感恩之心。谨此表达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二零一八年农历新年之际

于南京

序

汪 熙

大凡一个国家出钱援助另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不会没有政治目的而仅仅是因为同情而施舍。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折冲于中美之间，洽商美国的白银贷款和锡、钨贷款，历经甘苦，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国际间无慈善事业。”的确如此，在那个年代，慷慨解囊的仗义言辞后面，掩盖着的是国与国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在 30 年代对美国贷给中国的美麦贷款和棉麦贷款那么如临大敌，惴惴不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美国的对华贷款那么蹑手蹑脚，生怕触犯了“天羽声明”。原来这些贷款虽然都是财政行为，却牵动了中、日、美三国的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国际关系失衡，爆发危机。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贷款虽始于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际，但从规模和品种来讲都远远落在当时苏联援华的后面。这是因为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使苏联感到它的安全受到更直接的威胁。一直到日本与德、意结成三国同盟，南进太平洋的攻势日益露骨，美国的利益受到明显的威胁时，也只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才逐渐进入高潮。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和时断时续的过程又与二战的战场态势及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假使把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画成一根曲线，它的起落变化，往往是与中国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动的曲线相一致的，因为这些变动的后果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关，而美援是受美国国家利益所支配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美援的变动（数量、品种、时间）就成为观察中美关系及其相关的国际因素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标志。这个标志不但印证了我们已知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可以从它的起

伏升降和停顿与继续中看出中美双方和中美各自内部的各方或各派势力之间一些内在的矛盾与统一。这就把历史研究引向更深一层。任东来同志抓住美援这个综合标志来论述和分析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中美关系，确是别具一格，很有意义。

这本书给我们一个总的印象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那严峻年代的关键时刻，对抗击日本侵略是起了作用的，但这种援助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抑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武器，支援国外朋友集团的筹码，它服从于美国近期或远期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结论，值得人们深刻玩味。

1993 年 2 月于复旦校园

目 录

CONTENTS

序	汪 熙 / 001
第一章 有限援华 (1937 年 7 月 ~ 1940 年 9 月)	/ 001
第二章 全面援华 (1940 年 9 月 ~ 1941 年 12 月)	/ 030
第三章 中美抗日同盟的加强 (1942 年 1 月 ~ 1943 年 11 月)	/ 058
第四章 中美抗日同盟的危机 (1943 年 12 月 ~ 1944 年 11 月)	/ 086
第五章 从有条件军事援助到无条件政治支持 (1944 年 11 月 ~ 1945 年 12 月)	/ 118
第六章 美援的代价:《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5 年 6 月 ~ 1946 年 11 月)	/ 148
第七章 美援与中美外交抗日同盟透视	/ 169
附录一 附表	/ 195
附录二 大事记	/ 202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 207
附录四 1934 ~ 1936 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	/ 223
附录五 终身学习 乐在其中 ——任东来教授访谈录	任东来 胡晓进 / 241

第一章 有限援华

(1937 年 7 月 ~ 1940 年 9 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了中立政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无所作为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为此，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事变爆发后一周发表了一份不问是非无关痛痒的声明，他同时指示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告诉中国官员不要指望美国会给予任何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帮助。^①

但随着日本侵华步步加深，美国在华以及在东亚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受到直接威胁和损害。1937 年 12 月 12 日，日本飞机有意炸沉停泊在南京附近江面的美国“帕尼号”炮艇。这一挑衅行径使美国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帮助中国抗日将有利于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无所作为逐步转变为提供少量、有条件的商业贷款。1936 年以后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的行动遂成为这一转变的引线。

一 通向援华之路

（一）白银购买：美国对华贷款的先声

1937 年 7 月 8 日，在“七七事变”消息尚未传到美国的时候，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以换文的

^① 美国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参见博格《美国与 1933 ~ 1938 年远东危机》（D.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 - 1938*），坎布里奇 1964 年版，第 519 ~ 544 页。

形式达成一项白银协定，中国将继续向美国出售白银 6200 万盎司，价格为 0.45 美元一盎司。美国还允许中国以售银所得之黄金作抵押，从联邦储备银行获得不超过 5000 万美元的为期 6 个月的贷款。这项交易对双方都有利，中国因而得到了一批黄金和外汇，作为巩固两年前开始通行的法币的准备金。美国政府则因此满足了 1934 年国会《白银购买法》的要求。7 月 9 日，孔祥熙又向美方提出 5000 万元贷款的要求，帮助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和进出口银行表示愿意考虑这一请求，但国务院却以中日冲突前景不明，远东形势动荡不安为由，劝告上述机构推迟任何有关行动。为此，孔祥熙在途经巴黎回国时，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通过美国驻法大使威廉·蒲立德（William Bullitt）直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援助。^①

虽然罗斯福没有对这一要求作出答复，但他接受了国务院的建议，拒不承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国务院的这一建议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国利益。它担心承认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会减少解决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同时日本也会以此为由行使交战国权利限制美国的中立贸易。^② 美国的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以后在美国寻求贷款和采购军火开了方便之门。

为了安抚国会内外的孤立主义者，罗斯福还在 9 月 14 日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其他美国船只不在此限，但需自己承担风险，从而在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海岸的封锁。根据这一命令，中国政府购买的 19 架飞机虽然已经装船，即将起运，但还是不得不在美国西海岸卸货。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当时评价说，这一命令“对正在寻求帮助中国的国联各国人士是泼冷水，对中国抗战士气则是一个打击”。对此，中国政府在重庆和华盛顿分别向美国表示遗憾，罗斯福随后向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表示说，中国仍可采购美国军火，可先运至越南和香港，然后再转运到内地，^③ 从而避开美方 9

① 《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 年第 3 卷，华盛顿 1954 年版，第 612～613、616～617、619、338～339 页。

② 布卢姆：《摩根索传：危机年代，1928～1938》（J. Blum, *From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Crisis, 1928-1938*），波士顿 1959 年版，第 481 页；布海特：《纳尔逊·詹森与美国对华政策》（R. Buhate, *Nelson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密歇根 1969 年版，第 129～130 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1931～1941 年日本卷，华盛顿 1943 年版，第 201 页；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83 页；《美国对外关系》1937 年第 4 卷，第 530～532、536 页；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裕台公司 1980 年版，第 409 页。

月14日的禁令。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强调应该像隔离传染病人那样对待侵略者。这一演说是罗斯福释放出来的试探气球。其中心不是要采取什么制裁侵略者的措施，而是限于号召美国公众注意世界紧张局势，希望各国有所行动，防止侵略者的“瘟疫”蔓延开来。即使是这种态度，也在国内引起了孤立主义的轩然大波。但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对罗氏的态度表示赞赏。^① 这一演说的实际结果只是促成了《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某些决策者表现出帮助中国的倾向，摩根索就是最积极的一位。他把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与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考虑，相信日本在中国的胜利将鼓励其他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从而极大地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因此，世界和平是与中国能否长期抗战休戚相关的。^②

基于这一认识，1937年底摩根索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不顾国务院的暧昧态度，决定再次从中国购银5000万盎司，同时将中国以黄金抵押的贷款权利无限期延长。1938年3~4月间，他还第一次允许中国将这一贷款用于稳定通货（平准基金）以外的目的，从而成为一种事实上的购货贷款。此外，美国财政部还放弃了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中的两项限制性规定：（1）中国发行的法币准备金中1/4须是白银；（2）中国应继续铸造和发行银币。美国为此收购了中国已经铸好的300万盎司银币。^③ 这样，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里，中国向美国售银价值共达1.38亿美元，其中4800万美元用于采购战争物资。^④

在积极要求美国购买中国白银的同时，中国还一直向美国呼吁财政援助。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蒋介石等中国领导人多次致电罗斯福，请求美国给予中国财政贷款，但均遭美方婉言拒绝。官方的拒绝迫使中国在

①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0~151页；蒋介石：《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2324页。

② 《摩根索传：危机年代》，第481~482页。

③ 《摩根索传：危机年代》，第483~484页；杨格：《中国与外援》（A. Young, *China and Helping Hand*），坎布里奇1963年版，第61页。

④ 吴相湘：《第三次中日战争史》，台湾1975年版，第709页。美国从中国购银的总数量如下：抗战前（包括1938年7月8日协定）为1.88亿盎司，值0.49亿美元；战争中（到1941年止）为3.62亿盎司，值1.57亿美元。《中国与外援》，第62页。

纽约金融市场上寻求私人贷款。对此，美国国务院非但不予支持而且还向有关银行团大泼冷水。加之私人贷款条件过于苛刻，结果，中国的这一努力在1938年7月无疾而终。中国大使王正廷为此所花费的半年心血也付诸东流。^①

1938年6月，摩根索和当时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曾考虑过中国关于恢复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的建议，给予中国一笔农产品贷款。但赫尔坚持，只有同时向日本提供类似贷款，才能考虑对中国的贷款。^② 国务院显然不愿意在欧洲局势紧张之际，去触犯1934年4月日本的“天羽声明”。

这样，中国在抗战第一年中，除了通过白银出售得到一笔短期贷款外，在美国的其他求援努力几乎无一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努力毫无意义。如果把美国的白银购买，罗斯福和摩根索遏制日本扩张的想法，以及财政部、进出口银行等机构一度出现过的对华贷款的考虑等一系列分散的事实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未来美国援华政策的某种迹象。

（二）中国为争取借款而努力

虽然中国在白银出售过程中积累了与美国有关当局打交道的经验，建立了极有价值的私人联系，从而为争取贷款奠定了良好基础，但能否争取到援助最终还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努力程度、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决策者对此的反应。

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求援活动，只是当时中国政府向国外求援计划的一部分。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以后，中国对西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争取英法美等国联合或分别对华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对在华利益最多的英国寄予最大希望。直到1938年夏，中国的外交重点还一直放在英国，对美外交实际上是从属于对英外交的。^③

1938年上半年，中英两国就英国对华贷款问题进行了半年多的谈判。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37年第3卷，第610、832~833页；1938年第3卷，第59~61、74~75、519~522、526~529页。《战时外交》（一），第233~234页。

② 《摩根索传：危机年代》，第508页，1933年6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由于日本暗中破坏等原因，实际只利用1710万美元。

③ 参见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